

記者：莫言先生，首先我想祝賀您獲得 2012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。我想首先問您一下，就是…您出生在山東的農村，您的父母當時都不識字，是吧？您是怎麼會開始寫作的呢？

莫言：我確實出生在山東農村，但我的父親是認識字的。我的父親讀過私塾，在我們村裡算是文化水平比較高的，一個鄉村知識分子。他也是一直鼓勵我們讀書，而且我的大哥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，考上了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，這在農村是很少見的。所以他也在家裡留下了很多書。我從小就是讀我大哥留下的那些語文課本、歷史課本獲得了很多的知識。慢慢地因為是讀書、讀小說、讀文學，也培養起了自己對文學的興趣。

記者：那您是怎麼會開始寫作的呢？是自己選擇開始寫的呢？

莫言：寫作…我想任何一個作家剛開始都是一個癡迷的讀者。讀書讀多了，他就慢慢地想要寫作，想要學習寫作。而且在當時像我們這種農村青少年的心目當中，作家這個位置是至高無上的，若一個人能夠寫出小說來，就會感覺這個人非常非常了不起。主要是當時我們這個村子裡面，還是有一些知識分子，比如說，有從山東省會濟南回來的、讀過大學的人，他們也給我灌輸了很多文學方面的、作家方面的一些知識。這讓我從小實際上就對寫作有一種，特別的愛好、癡迷。外在小學裡上學的時候，作文成績也比較好，老師也不斷地表揚。就慢慢地多方面地培養了寫作的興趣。

記者：您可以多給我們談一下您的童年嗎？您的童年是怎麼樣的？

莫言：任何一個作家實際上剛開始寫作，都是自己童年開始，從童年開始，其是寫童年的記憶。我是 1955 年出生，等我有記憶的時候，恰好是中國歷史上最困難的一段時期。那個時候大多數人是吃不飽的，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艱苦，村子裡面也經常發生因為飢餓死人的這樣一種現象。我想在那樣一種年代裡邊，留給一個兒童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。我從小就記得村子裡很多孩子在冬天太陽出來的時候，坐在牆根下曬太陽。那時候我們每個人穿的都是破衣爛衫，衣不蔽體。另外，因為沒有營養，大家的肚子餓得很大，腿、胳膊都很細，就是很像那種飢餓的孩子的形象。再一個就是我在上小學的時候，我也比較調皮搗蛋，小學五年級就輟學回家了。輟學回家也不能加入到這種勞動力的大人的行列裡去，沒有多大的勞動能力。一個人放牛、放羊，那麼在這種孤獨的環境裡面，要想交流，那麼只能跟動物交流；只能跟周圍的植物交流。所以這樣一種童年的經驗，我想是比較獨特的。後來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就想起了自己童年的這些往事。然後我就把很多自己的童年記憶跟現實生活當中的很多靈感、事件、出發點結合到一塊，就構成了我最早的一批小說。

記者：為什麼您五年級的時候要離開學校？

莫言：那個時候正好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正好搞政治運動，階級鬥爭，搞得人人自危，我們家因為解放前土地比較多，成分比較高，所以像我們這種孩子，理論上

當然是可以上學的。但在實際過程當中，如果你稍微表現不好，所謂表現不好就是不讓老師喜歡你；老師不喜歡你，然後就被貶下來了，被剝奪了上學的權利。再一個就是當時感覺學校也沒什麼上的，學校的語文課就是學「毛主席語錄」。其他數學課什麼的，學生都在造反，孩子在學校裡實際上天天在打打鬧鬧。我父母親也感覺到像這樣的學校也學不到什麼東西。學校沒有讓我繼續讀書，他們也沒有爭取，覺得這樣的學校去不去都無所謂，所以很早就下來了。很早，11歲的時候就輟學回家了。

記者：那您當時心裡的感受是怎麼樣的？

莫言：心裡的感受還是很孤獨的，孩子還是喜歡成群結隊，跟自己差不多年齡的孩子都在學校裡讀書。儘管讀不到什麼書，但他們在一起打打鬧鬧，歡天…很歡樂似的。那我一個人趕著一頭牛，牽著兩隻羊，從學校門前路過，你看到與自己同年齡的孩子都在校園裡面高高興興的，而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個群體之外，那心裡首先就感覺到非常孤獨，另外也感覺到前途很渺茫。我那麼小就開始在村子裡放羊、放牛，這放到什麼時候是個頭？是吧？前途在哪裡？我長大以後可以幹什麼？就感覺到很絕望，也沒什麼希望，總之這個童年經驗這一段對我的寫作是至關重要的。我的小說裡面描寫了那麼多的動物，寫了那麼多的植物，描寫了那麼多兒童跟大自然之間這種親密的、神秘的關係，我想都是跟我個人獨特的經驗分不開。所以回過頭來回憶過去，一方面，我那麼小就不能上學，自己也感覺到很遺憾；另外一方面，我也感覺到幾分慶幸，假如沒有這一段痛苦的個人的童年經驗的話，那我能否成為一個作家還真值得懷疑。即便成為一個作家，肯定也不會是像現在這樣一個作家，寫的作品肯定也不是像我現在寫的這樣的作品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，這種很早就輟學，回到了農村；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；回到了鄉村文化裡面去，對我成為一個作家，還是有非常大的幫助的。當然我現在也不鼓勵為了讓孩子成作家，過早地把他從學校裡拉出來，是吧？讓他回到農村去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。我以前也曾經說過，儘管這一段童年的痛苦經驗，對我的寫作有很大的幫助，但若讓我重新選擇我的童年生活的話，那我當然還是願意選擇一個幸福的童年，而不願意選擇一個孤獨、飢餓的童年。

記者：它對您的寫作起了什麼樣的幫助？

莫言：首先我就是建立了我跟大自然之間的，這樣一種非常親密的關係，我想一個在校園裡面長大的孩子，跟一個在荒原上、草地上長大的孩子，對這種自然的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樣的，對這個動物和植物的感受也不一樣的，你天天跟一群差不多的孩子在學校裡，跟老師在一塊，那我天天跟牛羊、跟植物、跟草、跟樹木在一塊，那我對這些大自然的事物的感受，肯定是特別微妙、特別感情化，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，我覺得像牛羊、樹木，這都是可以跟人進行交流的，而且我也感到它們似乎能聽懂我的話，我覺得這種獨特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，再一個就是過早離開了兒童這個群體，進入了成年人的群體，那我當然沒有講話的權利，人家都是叔叔、大爺，是我的長輩，如果我插嘴講話會很討人嫌，但是我可以聆聽，是吧？我比一般孩子更早地在觀察成人世界，比一般孩子更多地聽到了成年人的…從爺爺、奶奶他們

這些人嘴裡講述的鄉村文化，這鄉村文化裡面包括，什麼歷史人物、傳奇、歷史事件，包括什麼妖魔鬼怪等等，狐狸變人、公雞變人這些故事，所以我的作品裡面有大量的，這樣一種民間口頭文學的元素，這跟這一段時間的體驗是分不開的，另外，以一個孩子的眼睛觀察世界，這是一個很獨特的視角，一個成年人看自己周圍的生活，他感覺到沒有什麼新鮮的發現，但是一個孩子，他實際上是從低往上，是一個仰視的視角，他可以看到很多成年人看不到的東西，所以這一點對我的寫作也非常有幫助，當然了，還有其他的一些方面，我一下子也難以一一盡述。

記者：我想您在童年的時候，就跟大自然有這麼親密的關係，那您現在看到…比如說現在中國環境的情況，會不會有什麼感想？

莫言：我實際上一直是一個保守主義者，那麼這樣一種保守主義的態度，在我的作品裡面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你看「生死疲勞」也好，「豐乳肥臀」也好，都對這種過度的開發、環境的破壞，表現了我這種很大的痛苦，甚至是憤怒，我一直有一種論點，我覺得大家應該放慢這種發展的步伐，不要過早地去開發很多東西，應該更多保留一種鄉村的、自然的文化，不要把所有的鄉村都變成城鎮，應該讓土地得到休養生息，不要讓土地像人一樣非常非常勞累，我一直對中國八十年代以來的，這種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痛心疾首，非常難受，當我看到我當年非常熟悉的農村，到處都建起了一些小工廠，當我看到我童年時期，游過泳、捉過魚的河流，變成了臭水溝，那我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，當我看到我的村子裡面的很多樹木上，都掛滿了這種破舊的塑料袋子的時候，我覺得這種白色污染是非常非常可怕，所以我在日本的演講裡面，我在國外的很多演講裡面，都表現了對這樣一種過度開發，單純地追求經濟效益的，殺雞取卵式的發展的一種批評態度。

記者：那咱們再回到咱們的話題。文學的話，您相信文學對於今天的廣大群眾有意義嗎？

莫言：關於文學跟現實生活的關係，關於文學跟人之間的這種情感關係，我想多數人都論述過。我覺得這個對文學的看法，第一，不要估計過高，因為一部小說、一首詩歌、一部戲劇，能夠改變一個社會現實，這樣的期望值太高了。當然在人類的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因為一部作品，一部文學作品而誘發了一場戰爭這樣類似的事件，是吧？但這是非常少的個例，在大多數的情況下，文學發揮的作用是非常微妙的。因為文學實際上就是通過藝術的形式，通過這種審美的方式，慢慢地像春雨潤物一樣，是慢慢地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。所以過高地把文學放到一個改變社會，改變人的生活這麼一個高位上，我覺得這是對文學的…給文學加上了太沉重的負擔。但也不能把文學貶得一點作用也沒有，好像文學就是寫著玩的，就是讓人看了哈哈一笑的，這也不是，我想文學它一個最寶貴的品質，就是在研究人的靈魂、研究人的心靈，來歌頌真善美的東西；來批評、揭露、暴露，黑暗的假惡醜的東西，它最終還是要讓人的心變得更加豐富和寬闊，讓人變得更加善良和美好。從而通過人的變化，導致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。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，我以前用過一個比喻，就是這個文學和社會生活的這種關係，很像人的頭髮跟人之間的關係一樣。你滿頭黑髮當然很好，既美觀，

又能對頭起到保護作用。而如果你像我這樣頭髮很少，也無礙健康，我也活得很健康，是吧？所以文學…社會裡面有很多的小說、很多的詩歌、很多的詩人、很多的作家，當然非常好，但如果這些東西沒有，少一點，好像也…大概也能活下去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學也好、藝術也好，就像人的頭髮一樣。但是最後，就是當一個人死亡以後，被埋到了地下，過了多少年重新被人挖掘出來，你發現他身上的一切都化為了泥土，只有他的頭髮還是存在的，也就是說，當社會上的很多東西都發生了變化，不存在之後，也許文學、藝術它還在存在。

記者：這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比喻，當您開始寫作的時候，您有什麼動力？有什麼想法？

莫言：我曾經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過，我最初寫作的動力就是，我想過上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幸福生活。這個說多了，我自己也感到有點厭煩。但是真是要問起來，還必須這樣說，因為我最早的寫作目的確實不高尚。有的人寫作說：「我要通過文學改變社會」，「我要用文學的方式」，「來塑造人們美好的心靈」等等…很多這樣給文學下的定義，實在是太多了。中國現在像我這樣的出生於農村，或是曾經在基層、底層生活過，經歷過這種貧困生活歷練的一批作家，最初寫作的目的大概都是很樸素的，甚至是很低下的，就是為了吃穿，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，為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，拿起筆來寫作，實際上是很功利的。當然在寫作的過程當中，通過寫作，使自己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之後，那麼很多關於文學的其他想法，也就隨之產生了。所以最早的這種動機確實並不高尚，甚至還有一點低俗，但它確實是我當時的一種真實的想法。因為我剛才講到了，我們村子裡還有一些鄉村知識分子，也有一些在六十年代的時候，在大學裡面犯了錯誤，當然現在說的所謂「犯了錯誤」，應該加上引號，是吧？像這樣一些人被貶回到鄉村去，他們也跟我講文學，其中我的一個鄰居就曾經跟我講過，他所認識的一個作家所過的腐化生活，那就是一天三次吃餃子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因為當時在農村像我們這種家庭，一年只有在春節期間，可能吃這麼一次或者兩次的餃子，竟然有的人可以一天三次吃餃子，那我們簡直可以說不可思議，國王也許都過不上這樣的生活，因為他是一個作家，所以我就問他：「如果將來我能夠寫出一本書，是不是也能過上這樣的好日子？」他說：「當然，一定會的！」所以最早就是有這麼一個事情。

記者：那這個動力…就是說，今天您寫作的動力是什麼？

莫言：今天我想我確實可以一天三頓吃餃子，甚至我半夜睡醒了要吃一頓也能吃上，從冰箱裡拿出來就可以煮著吃，那麼在這樣一種情況下，我當初那種最低俗的願望，早已得到了滿足，那麼是什麼力量在激勵著我，繼續不斷地寫作下去呢？我想這確實是一兩句話也說不清楚的，大概來說，第一個是，我心裡面感覺到要有話要說，我想把我心裡面想說的話，通過筆寫成作品，告訴我的讀者；第二，我感覺社會上發生了很多事情，我有責任來寫，再一個就是，我對文學本身的這種藝術的探索創新，在激勵著我寫，我想從有了小說這種形式，大約有一千多…起碼數百年過去了，甚至上千年了，關於這種文學藝術、小說藝術，這種創新的作家也是成群結隊，大家都在對小說這種藝術進行創新，從語言上、形式上…那麼像到我們這一代作家，是不是還有創新的可能性？我覺得還是有，我覺得小說這種藝術的發展，是無

窮無盡的，它的這種形式也可以有無限的可能性，也就是對小說藝術這種癡迷的追求，也是激勵著我不斷寫下去的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。

記者：您為什麼要用筆名？筆名為什麼是莫言？

莫言：我在下午的新聞發佈會上，記者招待會上也曾經講過了，我的原名，管謨業，中間一個字拆開，正好是莫言，因為這個繁體字的話，左邊一個言字邊，右邊一個莫字邊，另外，我原名管謨業，這個「謨業」跟「莫言」也是諧音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從小，確實是一個很喜歡說話的孩子，在那個時代裡面，說話太多，很容易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，這個麻煩有時也不僅僅是政治方面的，你說了什麼反動的話了，是吧，有時候也是人際關係方面的，你可能因為多說話得罪了自己的鄰居，讓父母親不高興，讓人家來跟父母親算帳，所以我小時候，因為這種饒舌，多嘴多舌，確實給我父母親增添了很多的麻煩，他們也經常批評我、教育我，甚至罵我說…罵我這種喜歡亂說話的毛病，所以等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，我也有一種…甚至是迷信的想法，很多作家，大作家都有一個筆名，什麼魯迅、巴金，我們知道的，他們都用筆名來寫作，國外的很多作家用的也是筆名，是不是作家要想寫出小說，首先要給自己起一個筆名呢？所以我想我還是應該給自己起個筆名，正好想到「莫言」這兩個字，這裡面也包含了一種對父母親的這種教育的致敬吧，還有一個就是，自己給自己的一種暗示和激勵，我覺得一個人既然要從事寫作，就還是得要少說多寫，講話多了，既耗精神，又耽誤時間，如果你把用來說話的時間和精力，放在寫作上，那就能多寫出很多作品來，所以也有激勵自己，好好寫作，埋頭苦幹的這種意思

記者：如果您回顧您的作品的話，是否能看到裡面會有一個反覆的話題，或者一個反覆的角度？

莫言：這裡面反覆的話題，一個是飢餓，再一個是孤獨，這個我也多次說過，這可能是我小說裡面，尤其是早期小說裡面的，兩個非常重要的話題，因為這兩個事件對我的影響最深最重，一旦寫到過去的生活，這兩個主題必然被涉及到，我想還有一個，一直讓我追求不懈、堅持至今的，就是對人的靈魂深處的奧秘的，這種探索的興趣，人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有好人和壞人？為什麼面對著同樣的事物，人的反應不一樣？為什麼有的人天生就那麼好？有的人生在一個很好的環境裡，受了那麼好、那麼高級的教育，但他長大以後會變得那麼邪惡？我覺得這些都是難以理解的事情，所以我想通過我的筆、通過我的寫作，找到一個答案，來研究一下這個最深層的，也最沒有準確統一答案的課題。

記者：這個讓我聽起來像是心理學一樣的，您有沒有找到答案？

莫言：沒有找到答案，有時候我甚至很宿命、很迷信，我覺得有時候…過去我們講究就是說，後天的教育勝過先天的遺傳，我們講一個人所謂的壞、一個人的好，主要是來自後天的教育，但是我經過長期的觀察和那種體驗，我覺得有時候不完全由後天來決定的，有的人天生就是

這樣，他的思維方式就跟別人不一樣，他生下來就是要損人利己的，有的人他生下來就是能夠忍辱負重，能夠為別人來做好事的，這個我覺得只好歸於上帝了，因為上帝為了讓人類的世界更加豐富，就製造了一批真正的聖人，就是這種超出一般人道德水平的聖人，就像我們中國人講的孔聖人，是吧？這樣的人，這樣一種人是無私的、利他的，是能夠為他人獻出一切最寶貴的東西，這樣的人不是教育的結果。另外，大部分的人，都是跟你我差不多的人，我們有自己的這種最基本善良的層面，我們的內心深處也會有一個比較灰色的地帶，有時候也有利己的東西，有時候也有低下的情緒，大部分人跟我們差不多。那麼也有一部分人是跟聖人相對應的，這就是這種天生的惡人，這種人是沒有道德感的，我們這樣的人…因為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，所以當我們幹了某件傷害別人的事時，我們會內疚、自我譴責，甚至會懺悔，但這種天生的惡人他們沒有道德底線，甚至沒有道德觀念，他們做了很多我們認為極壞的事情，他們是沒有，他們是心安理得的，不會內疚的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只好把這一切的原因，都放到上帝那地方去，上帝造出了差不多就是這三類人，來讓這個人類社會有比較

記者：您有信仰嗎？

莫言：我是一個多神論者，這跟我童年時期在田野裡放牛有關係，在那樣一種環境裡面，我就感覺到萬事萬物都是有靈魂的，我覺得馬爾克斯…加西亞馬爾克斯也說過類似的話，他說「萬物都有靈性，就看你怎麼樣喚起」，那我當時在放牛的時候就感覺到，天上的鳥、地下奔跑的動物，包括周圍的一草一木都是有靈魂的，都是有感覺的，所以我想我最早是一個泛神論者，再一個這種文化在我們鄉村普遍存在，離我的故鄉不遠的地方，出過一個很著名的大作家，清朝的蒲松齡，他的很多小說裡面講神講鬼，講各種各樣的動物、植物，變化成人的故事，所以這樣一種文化在鄉村裡普遍存在，蒲松齡筆下的這樣的一些故事，我從我的爺爺、奶奶、我的鄰居身上，也聽到了很多，所以那個時候是這樣的。當然後來我長大了，進入了城市，我也學了很多的理論，也學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，也學了各種各樣的有神的一些理論，後來我覺得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，實際上都是人類的精神財富，都是應該從學術的角度來研究的，所以我現在覺得我有信仰，我尊敬所有教人向善的這樣一種宗教，但我並沒有成為哪一個教的教徒

記者：現在咱們的時間馬上就要結束了，我想問一下諾貝爾獎金，對您意味著什麼？對您有什麼意義？

莫言：這諾貝爾獎金…我在中國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，也開過一個玩笑，他們問我：「你得了獎金，這麼一筆大的獎金，你準備幹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我準備在北京，買一套比較大的房子。」後來也有人馬上就說：「你買不了多大的房子。」因為北京的房價太貴了，頂多能買一個一百多平米的房子，我想我沒有這筆諾貝爾獎金，我當然也生活得很好，也能夠滿足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，但有了這筆獎金，我的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第一個，我不要像過去那樣，就是為了用寫作來養家餬口，快速地、拚命地寫作，我可以慢慢地精雕細琢，可以有時間讓我的

作品寫得少一點，寫得精一點，寫得更好一點，另外，這筆獎金我也可以用來幫助，我的故鄉那些需要我幫助的人，親戚朋友或者是鄉親們

記者：謝謝您，莫言先生，再一次祝賀您

莫言：謝謝，好的…